



上卷

王守稼

吳乾兑

許道勳

董進泉

劉修明

(按姓氏筆劃排列)

校點註釋

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

顧廷龍敬題



王守稼

吳乾兌

許道勳

董進泉

劉修明

(按姓氏筆劃排列)

校點註釋

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

顧廷龍敬題



(冀) 新登字 003 號

鄧逸麟

譚其驤

參加本書部分注釋工作的還有

楊寬 王運熙 顧易生 章培恆
王文楚 李霞芬 潘咸芳等

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

王守稼

吳乾兌 許道勳 董進泉

劉修明 (按姓氏筆劃排列) 校點注釋

出版：花山文藝出版社

(中國·石家莊市北馬路55號)

總發行：花山文藝出版社

經銷：新華書店

印刷：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中國·保定市省印路1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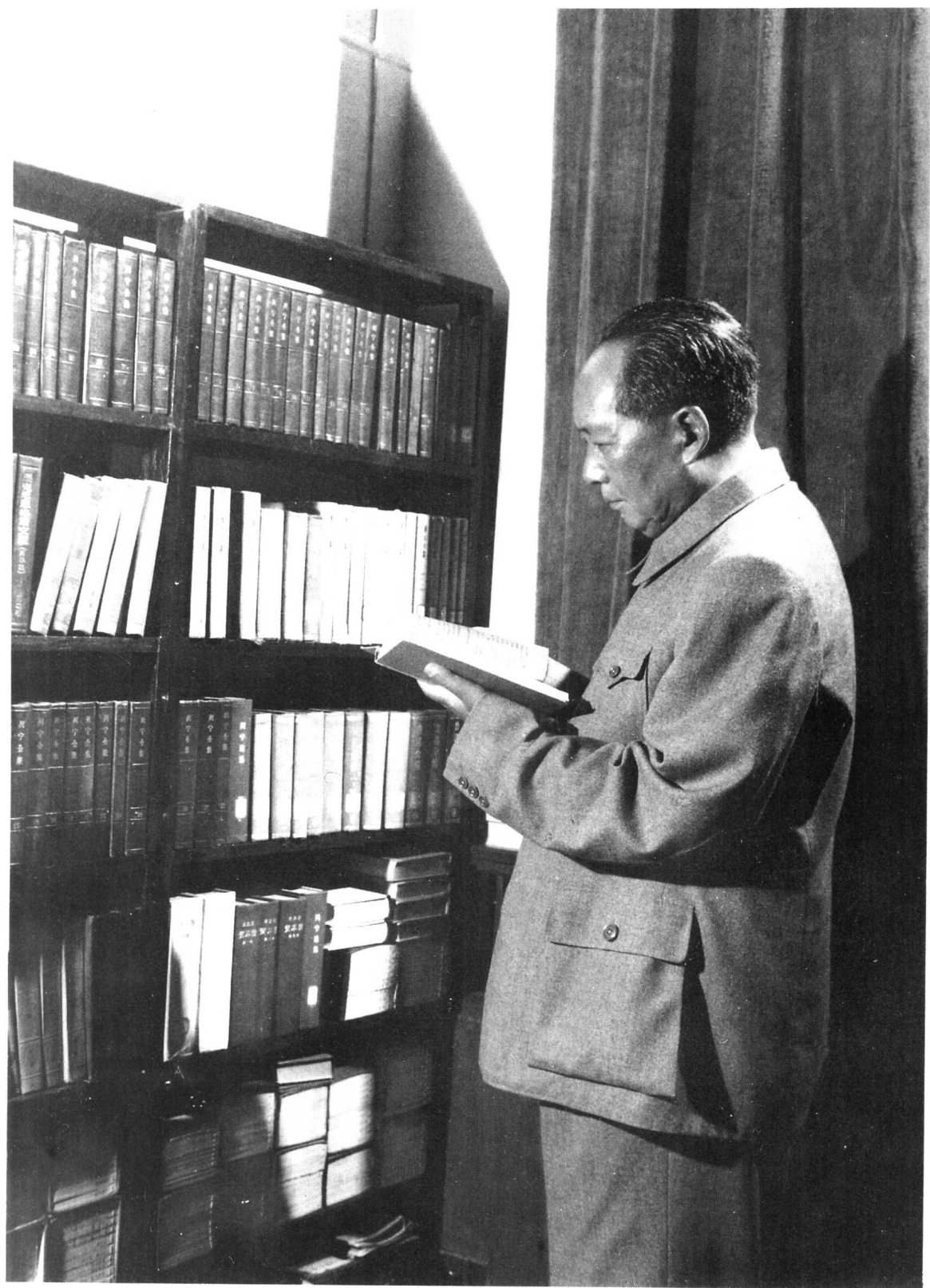
定價：捌拾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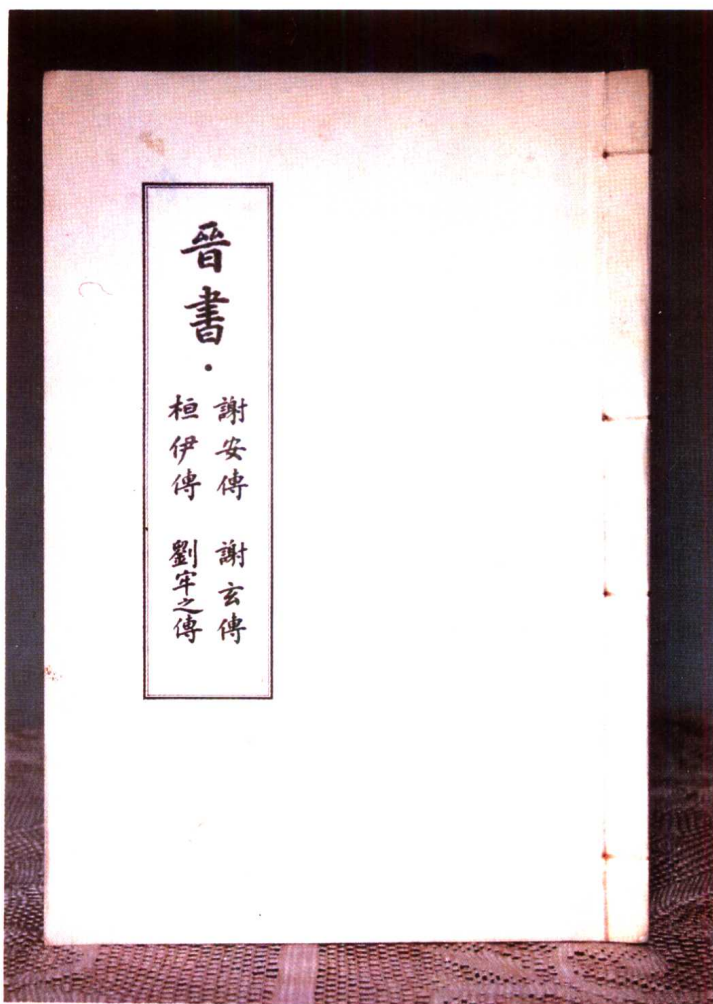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16 60 印張

625 千字 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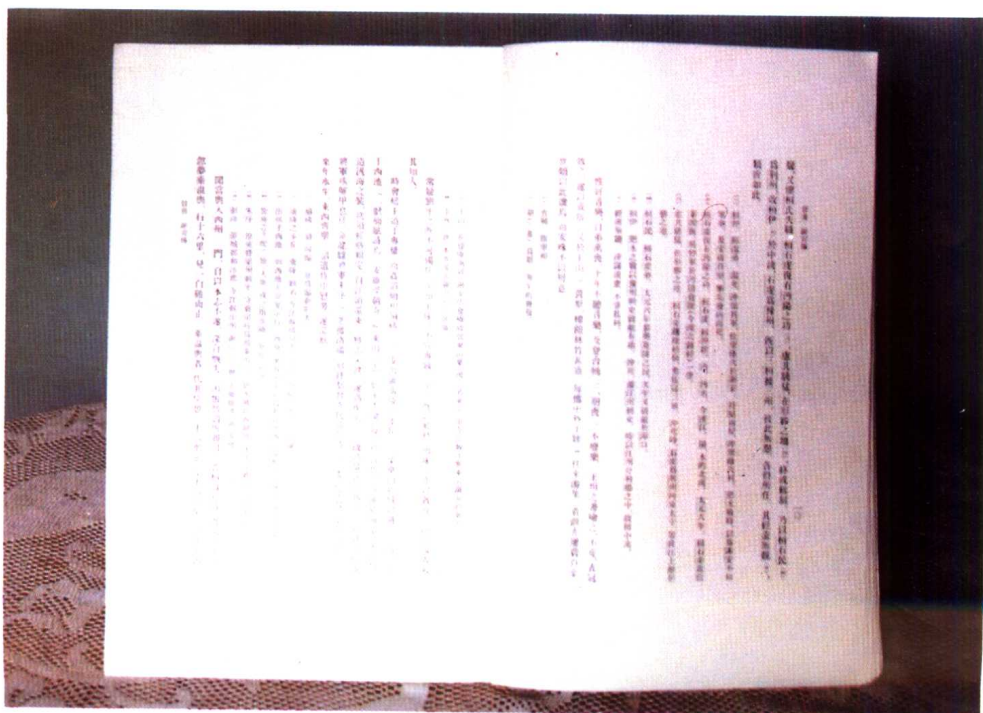
ISBN 7-80505-764-2/1·704





“大字本”《晉書·謝安傳 謝玄傳 桓伊傳 劉牢之傳》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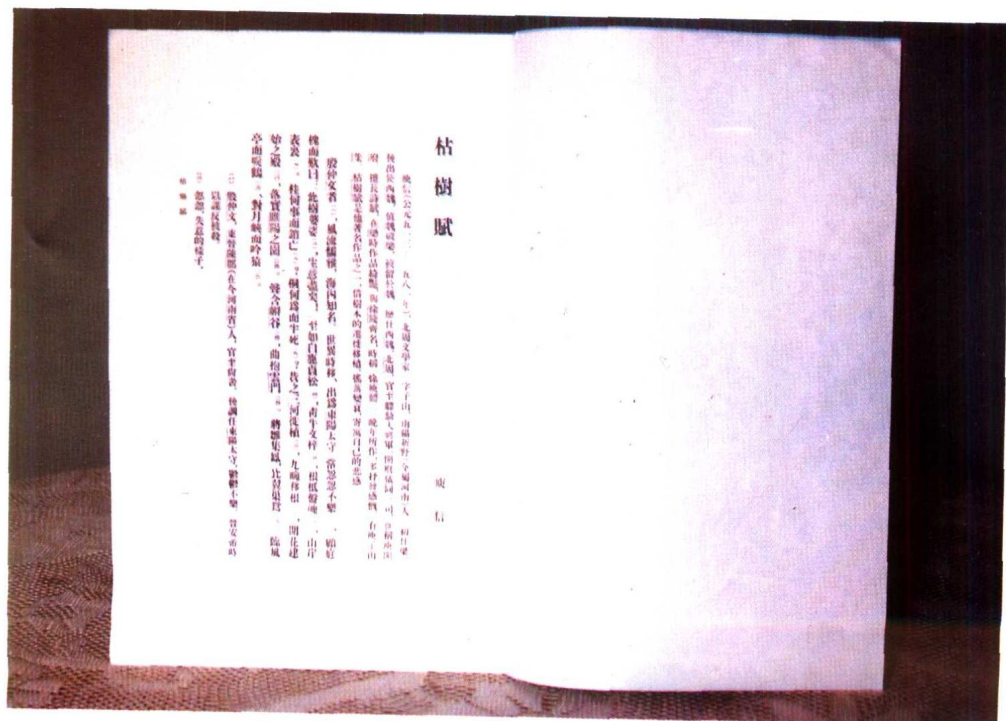
“大字本”《晉書·謝安傳》正文第十、十一頁





“大字本”《枯樹賦 月賦 雪賦》封面

“大字本”《枯樹賦》正文第一頁



前言

劉修明

(一)

毛澤東一生手不釋卷。對於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文化，像他那樣熟悉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近代的政治家，是不多見的。他讀過大量的中國古籍，從大量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繼承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他對古書內容的理解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令人驚嘆。他善于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閱讀和解釋中國古書的內容，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新的解釋，提出新的見解；他又善于汲取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精萃，並賦予新的含義，為現實鬥爭服務，即他常說的「古為今用」。所有這一切，是同他高度的理論文化修養和在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地位分不開的。沒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沒有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要做到像他那樣自如地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借鑒和運用，是難以想像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同毛澤東

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熟悉和借鑒，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

當然，無可諱言，在毛澤東的晚年，由于國內外復雜的政治環境和「左」的指導思想，他在引用古籍典故和借鑒歷史經驗等方面，也有失之偏頗的地方。歷史沉澱的承襲作用，對他也產生某種消極影響。這是應當引以為戒的。這是另一層意義上的借鑒。由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處置失措，加上他健康狀況不佳和心境的不寧，又造成毛澤東晚年思想感情上的巨大起伏。這種思想感情的波動，充分表現在他對大量古典辭賦詩詞的閱讀和寄托上。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在復雜的政治鬥爭和社會生活中有豐富思想感情的普通人。

讀書可以反映一個人的思想。只要不是漫無目的的瀏覽，一個人讀什麼書，在什麼情況下為什麼目的而選讀什麼書，同樣反映一個人的思想。通過了解毛澤東在他晚年的特定時代條件下，對中國歷史古籍、文選、古典詩詞有目的、有選擇的閱讀，可以從一個側面研究、探討毛澤東所關注和思考的問題，也可以探尋他思想深處的感情世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和指示點校、注釋和印製的「大字本」，就是毛澤東晚年閱讀歷史古籍、古典辭賦詩詞的產物。嚴格地說，「大字本」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開始階段印製的這種本子字號並不很大，正文用四號老宋，注文用小四號老宋，以後字號才逐漸加大，從正文三號老宋、注文四號老宋，發展到正文二號老宋、注文三號老宋。隨着毛澤東眼疾的加劇和視力的衰退，特別是他在一九七五年因老年性白內障發展（同年八月做了眼科手術）後，字體

更放大為特製的三十六磅特大號長宋字體，並以這種字體印製了一大批書，這才成為所謂「大字本」。為方便起見，我們習慣上把一開始進行點校、注釋的古代文獻，都稱之為「大字本」。

由于工作關係，當時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的王守稼（一九七八年以後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許道勳、董進泉（一九七八年以後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吳乾兌、劉修明，被借調參與了「大字本」的點校、注釋工作。此外，參與部份注釋工作的，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譚其驤、楊寬、鄒逸麟、王文楚先生，中文系的王運熙、顧易生、章培恆先生等人。我們參與注釋的這種「大字本」和後來用三十六磅特大號長宋字體印成的其它「大字本」（如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用三十六磅特大號宋體字印成大字本）不同，具有毛澤東指定的性質，即毛澤東在晚年某一時期，為考慮某一問題，需要參考、借鑒某一篇歷史文獻，以達到某種目的的特定性質。因此，這種大字本本身雖然仍屬古代歷史文獻或古典文學作品，但它們因此而具有了特定的時代意義和當時的歷史價值。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從這些指定校點注釋的古代文獻中，可以研究和推測毛澤東當時所思考的某些問題，了解他的心態和思想情緒（一般地說，辭賦詩詞等文學作品，更能成為寄寓情緒的載體〔注〕）。

【注】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曾寫信給劉思齊說：「你愁悶時可看點古典文學，讀詩句，可起消愁解悶的作用。」（見《生活中的毛澤東》，華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二〇二頁）

近年來，有關毛澤東的傳說和回憶文章發表了不少，其中也涉及到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然而有關大字本的材料只是鱗爪，內容也不具體。

參預大字本點校注釋和整理工作的五位同志，都是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史學研究工作的職業本能和參加這項工作的實踐，使我們充分認識到這批材料的價值。為了保留這批珍貴的歷史材料和版本，我們整理了大體完整的兩套大字本，分別送給上海圖書館古籍部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資料室保存。由於這批材料是在毛澤東晚年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們就具有特殊的價值，是重要的史料。這些古代文獻，從它們本身說來，是人人都能查閱到的公開的材料，但當它們和一位關係到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歷史人物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活動相聯係時，這些古代文獻所包涵的內容和意義，就超出了它們的本來價值和原有的意義，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對研究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活動，具有不可忽視的直接和間接的作用和意義。

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年，毛澤東已成為一位歷史人物。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已成為國內外有關學者越來越關注和研究的課題。特別是他晚年的思想和活動，更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將這批文獻材料匯集整理出版是有意義的。加上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即將到來，在這種情況下，花山文藝出版社以《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為書名，將這部份材料匯集出版，目的是為了給研究毛澤東提供一份有價值的文獻材料。這對國內外研究毛澤東及其生平、思想和事業的學者來說，是會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二)

大字本校點注釋和印製的時間，是一九七二年秋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中旬，前後經過四年。全部篇目共八十六篇，總字數約八十多萬字。

最早佈置大字本的校點注釋任務，是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當時佈置的是《晉書》中的《謝安傳傳》、《謝玄傳》、《桓伊傳》、《劉牢之傳》，要求將四傳標點簡釋，合訂為一冊。這是我們接觸到的最早佈置大字本的情況。以前有沒有搞過大字本，不得而知。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晉書》四傳的注釋任務是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下達的，但具體注釋任務直到一九七三年初才向我們佈置，為什麼拖了三個多月，原因也不清楚。我們第一次注釋的是《舊唐書·傅奕傳》，而不是《晉書》四傳。時間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完成。《晉書》四傳由於佈置遲了，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才完成。注釋工作是在上海圖書館西大樓三〇六室進行的，主要是為了利用上海圖書館的藏書，可以及時借閱參考。注釋本搞好後，送到上海普陀區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印刷裝訂。所以找中華印刷廠，是因為中華印刷廠印刷古籍比較有經驗。不料，在當時「文化大革命」否定一切傳統文化的氛圍下，中華印刷廠製繁體字的銅模，已經賣給了內地（記得是江西）一家小印刷廠。為了趕印這份只有幾頁的大字本，中華印刷廠趕緊用一套新的簡體字銅模把那套繁體字銅模換了回來，才得以完成任務。《舊唐書·傅奕傳》正文用的是四號老

宋，注文用的是小四號老宋。《晉書》四傳字號相同。以後在一段時間內（從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注釋《晉書·劉元海載記》），印製的大字本都是用這種字號（即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這種大字本的版本長三十厘米，寬二十厘米，版心高二十點五厘米，寬十四厘米。《舊唐書·傅奕傳》沒有封面，也沒有封面題簽。從《晉書》四傳開始，加上封面，並請書法家、上海圖書館館長（「文革」期間，當然不任此職）顧廷龍先生，用「館閣體」書寫了《晉書·謝安傳 謝玄傳 桓伊傳 劉牢之傳》的書名題簽，題簽高十八點五厘米，寬四點五厘米。《晉書》四傳用的是六十克的米色道林紙，封面、封裏同。裝訂用綫裝，穿綫在右邊。最早搞的《舊唐書·傅奕傳》是簡裝，紙張是普通的書寫紙。《晉書》四傳以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字本都是用道林紙綫裝。上述大字本完成後，《舊唐書·傅奕傳》上送十份，《晉書》四傳上送十五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達了六篇古文注釋任務，包括屈原《天問》和柳宗元《天對》（合一冊）；《三國志·吳書·呂蒙傳》、《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合一冊）；《史記·項羽本紀》；《明史·朱升傳》。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完成並上送，也是十五份。為何注釋這些古文，沒有交待。當時社會上都知道毛澤東的三句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很明顯，這和《明史·朱升傳》中的三句話「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是有聯係的。關於《呂蒙傳》，據說毛澤東在談到《呂蒙傳》等《三國志》列傳時，曾說過：文化不高的也可學文化，並舉了東吳大將呂蒙的例子。《呂

蒙傳》注文中說孫權勸呂蒙讀書，「（呂）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注引《江表傳》）顯然，毛澤東是借呂蒙讀書一事勉勵高級幹部要重視文化學習。

《晉書》四傳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完成上送後一個星期（二月七日），就傳來消息（我們是以後知道的）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讀了《晉書》四傳後，指出《晉書·謝安傳》第十一頁（見本書第十三頁）第六個注解中「濉溪」二字疑是「濉溪」之誤。後來查對底稿，發現是中華印刷廠排字時排錯的，校對時又沒有校出來，以致搞錯。毛澤東閱讀時發現注文上的這個不易引起人注意的錯誤，說明他閱讀時十分仔細。為了這件事，還專門向中華印刷廠打了招呼，同時再三囑咐我們注釋校對時工作必須過細。

一九七三年二月七日佈置注釋的史傳，有《三國志·魏書·張遼傳》、《三國志·魏書·張郃傳》、《舊唐書·李愬傳》，三篇史傳合訂一冊，五月一日完成，上送十五份；六月十九日佈置注釋《史記·汲鄭列傳》、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兩種合訂一冊，完成日期不詳，上送五份。七月間，佈置注釋《舊五代史·李襲吉傳》，八月四日完成，上送五份。八月以前，我們還按佈置的任務，整理了《史記選》，內容共有五篇：《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黥佈列傳》、《灌嬰列傳》、《陸賈列傳》。這五篇都是《史記》中的重要篇章，每篇都有它特定的主題。佈置任務時明確說不要作注釋。因此，我們按照中華書局《史記》標點本抄錄、校對，送中華廠印刷裝訂為一冊。當時顧廷龍先生到北京探親，不在上海，無人題簽，是緊急打電話到上海中國

畫院聯係，請畫院的一位同志寫了《史記選》的題簽。以後的《張元幹詞》的題簽，也因為顧廷龍先生外出，請上海中國畫院的同志寫的。絕大多數大字本都是顧廷龍題寫的館閣體題簽，就是《史記選》和《張元幹詞》的字體略有不同。這件事，是我具體經辦的，所以記憶猶新。《史記選》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初上送，份數不詳。

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前，我們還注釋過《晉書·劉元海載記》，「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典，即出此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談話時，曾引用《劉元海載記》中「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這句話，而且說要把「鄙」字改成「恨」字。前面提到的《史記選》中的《絳侯周勃世家》和《灌嬰列傳》，顯然也與此有關。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前注釋或整理的大字本，主要是史傳類的古籍。

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後，佈置我們注釋的大字本，內容有了顯著的變化，即從史傳類轉向古代和近代某些思想家寫的史論、政論以及哲學文章（包括個別內容相關的詩歌）。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一首七律詩《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須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猶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不從子厚返文王。」〔注〕我們幾乎是立即接到注釋柳宗元《封建論》的任務，突擊

【注】這是據我們當時傳達的抄件記錄下來的。後來傳聞的小有區別，「少罵」作「莫罵」，「須商量」作「要商量」，「秦猶在」作「業猶在」，「猶行」作「多行」，「秦政法」作「秦政治」，「不從」作「莫從」。當以將來正式發表的為準。

進行注釋，八月十一日就印成大字本，而且字體放大，從原來的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改為正文三宋，注文四宋。印製時用了不同的紙張，除用原來的六十克米色道林紙印製二十本外，還用宣紙印了兩本，封面是定製的藍色封面紙，書名條簽是白色的，十分醒目。從這時開始，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印製的江淹的《別賦》、《恨賦》，都是這兩種式樣。大字本《封建論》除上述二十二本外，還有一本在頂部裝訂，便于豎翻加批注的本子。

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佈置注釋章太炎著的《秦獻記》、《秦政記》二文。太炎二記已有北京注釋的簡注本，我們見到過這個本子，看來是叫我們重注的。八月中旬注釋印製完畢，上送五份。八月份，還佈置注釋了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秦始皇》（節選），上送份數和時間不詳。這一個月內，還佈置注釋韓愈的《石鼓歌》，特別指明要「詳注」「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這兩句詩，以說明孔子是拾了芝麻丟了西瓜。由于《石鼓歌》涉及到先秦石刻《石鼓文》，佈置時要求對《石鼓文》作一介紹。由于《石鼓文》文字殘缺很多，而且文義艱深，不易注釋，以前從未有過注釋本，為此，我們請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楊寬教授一起參予注釋工作。《石鼓文》及其注文連同我們找到的石鼓圖版一幅製版後，一起附入《石鼓歌》注釋本中上送。時間、份數均不詳。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佈置注釋柳宗元的《詠荆軻》詩，要求重點注釋這首五言詩的最後六句，即「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

且。」指明要批判荆軻的「勇且愚」，對秦皇的「詐力」的「詐」，似應作正面解釋。這一篇于十月十日完成并上送，其中道林紙本五本，宣紙本二本，共七本。由于在此之前曾在一定範圍內分送過一些，為「杜絕後門」，嚴格了發放範圍，規定每次上送五冊（宣紙本二冊，道林紙本三冊）外，概不分送。為保險而多印的本子，也作為檔案封存，以備急需時調用。從此，參預注釋的同志也沒有再保留正式本子，只留有清樣。大字本的注釋工作，從此更加保密。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佈置注釋李贄《藏書》中的《世紀列傳總目前論》。注釋、印刷完成後上送道林紙本五冊（按上述規定，多了兩冊），宣紙本兩冊。十月十五日又佈置注釋韓非《五蠹》篇（有幾位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同志參加注釋），由我們送中華廠印製，完成後，上送五份，確切時間不詳（當在十月底）。一九七三年佈置的最後一篇大字本注釋，是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只要求分段、標點，不作注釋，但要求作一題解，在題解中摘出關於支持李自成、義和團和批孔批儒的觀點和內容。在此之前，每篇大字本只要求作點校、注釋，而無題解，從《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開始，除個別外（如《論衡·問孔》無題解），都在正文前附有「題解」，說明本篇的主要內容并簡要介紹作者的生平事迹。

從一九七四年三月開始到一九七四年七月，轉入所謂「法家」著作的大字本注釋。實際上，從一九七三年八月注《封建論》伊始，已經開始了這一類古文的注釋工作。一九七四年三月最早佈置的是王充《論衡》一書中的《問孔》篇。四月四日又佈置了《論衡·刺孟》、《韓非子·